

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

ICS BULLETIN

二〇一九年 第二期

學術論衡

中國現代派與歐洲左翼文藝的研究

——兼論封存七十年的戴望舒〈致艾田伯〉信函

鄭可怡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一、引言

中國「現代派」的指稱早見於三十年代，¹指涉的作家群（施蛰存、戴望舒、劉呐鷗、穆時英、葉靈鳳等）駐足世界主義和現代都市文明為基礎的城市——同是革命的根據地——上海。他們面向世界追尋藝術和意識型態的先鋒者位置，但經歷大革命的失敗（1927）、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和解散（1930—1936）、中日戰爭爆發等歷史時刻（1937），不斷面臨新的政治危機。文學與政治之間關係的探索不再限於口號和宣言，它漸次成為一種艱難和危險的實踐活動。三十年代的中國現代派不僅直接或間接（以日本為中介）與歐美現代主義發生碰撞，作家們同時廣泛接觸國際左翼文藝思潮且深受啟發。面對國內左翼文藝的擴張，以及歐洲左翼思潮跨地域、跨文化的迅速傳播，他們從高度政治壓力之下的邊緣位置借鑑不同地域、傾向各異的左翼文藝發展經驗，反躬自省並就各種政治與文藝傾向的矛盾尋求協商。他們的編輯活動、翻譯、創作和評論，為考察二十世紀兩種最具影響力的思潮——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對抗以及相互作用的獨特形式，提供了極不相同的案例。²可是自三十年代始，中國左翼的評論家多批判現代主義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體系衰落的文化，往後漫長的時間裡中國現代派的寫作亦受到否定和批評，以至現代派作家在時代轉折之際追求政治與藝術雙重先鋒性的特點，甚或在理論層面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主義美學主張交疊的可能性，都未能獲得充份探討的空間。

針對上述的研究情況，我們試圖在世界文藝思潮的宏大版圖之下重構中國現代派與歐洲左翼文藝之間的關係脈絡，從而揭示中國現代性發展的混雜性（hybridity）和異質性（heterogeneity）特點。部份研究成果已結集成書，³不過書內特別提及一封封存了七十年、由中國現代派詩人戴望舒（1905—1950）回覆法國

著名漢學家及比較文學學者艾田伯 (Réne Étiemble, 1909–2002) 的信函，還是值得再加細讀。此信在艾田伯離世以後才得到整理出版，信中戴望舒不僅以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的身分自居，還批評了法國著名左翼作家馬爾羅 (André Malraux, 1901–1976) 及其以中國革命為題的小說《人的狀況》 (*La Condition humaine*, 1933)。下文將以此信為出發點，探討艾田伯和戴望舒在交互鏡像 (miroirs-croisés) 之中展現左翼知識份子的姿態，並略述中國現代派與歐洲左翼文藝研究的幾個面向。



馬爾羅 (André Malraux)，攝於1934年。
(圖片來自Archive Philippe Halsman)

二、互為鏡像中的革命者身影

相隔四十多年以後，艾田伯在其著作《我信奉毛澤東主義的四十年》 (*Quarante ans de mon maoïsme*, 1976) 裡回憶中國現代派詩人戴望舒，描述他為「西方化並同情共產主義的詩人」 (le poète occidentaliste et communiste)。⁴ 及後他向首部戴望舒研究的英文專著作者利大英 (Gregory Lee, 1955–) 憶述年青時遇上的中國詩人，同樣毫不猶豫指出戴望舒鮮明的政治取向：他是個「嚴酷的、正統的共產主義者」 (un dur, très orthodoxe)。⁵ 可以推想，艾田伯的觀點絕不是三十年代中國左翼評論家所能認同。他對戴望舒的理解和判斷，亦源自特定的歷史語境和事件。三十年代，還是學生的艾田伯熱枕於中國哲學及文化，正努力學習中文。他一方面與法國左翼知識分子交往從密，參與蘇聯國際革命作家聯盟影響下在1932年3月法國成立的革命文藝家協會 (Association des écrivains et artistes révolutionnaires) 舉行的反法西斯活動；另一方面則準備跟隨與他政治意見相合、同樣「欽佩中國，希望中國革命成功」的漢學家拉盧瓦 (Louis Laloy, 1874–1944) 撰寫論文。艾田伯當時深信中國只能通過左翼革命方能自救，並研究中國革命文學，願意向法語讀者介紹當下中國真誠、動人及藝術性的一面。在這背景之下，他由法國共產黨機關刊物《人道報》 (*L'Humanité*, 1921–) 的主編瓦揚—古久列 (Paul Vaillant-Couturier, 1892–1937) 引介，認識了來自上海、正值留學法國的戴望舒。從1933年11月至1935年4月戴望舒回國以前，二人保持緊密聯繫。⁶ 他們不僅合作為革命文藝家協會的機關刊物《公社》 (*Commune*, 1933–1939) 出版「革命的中國」 (Chine révolutionnaire) 專號，還積極籌備出版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的法文翻譯，書信往來更廣泛論及當時法國的知識分子。



1934年法國革命文藝家協會的機關刊物《公社》 (*Commune*) 出版「革命的中國」專號。

1934年6月19日寄出的信件裡，艾田伯向戴望舒提及自己正忙於撰寫有關馬爾羅的長文，並希望在馬爾羅動身前往蘇聯以前完成。馬爾羅於5月底啟程往倫敦，6月14日到達列寧格勒，參觀後再乘火車到莫斯科準備出席8月17日至9月1日舉行的蘇維埃作家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舉行以前艾田伯在信中 (1934年8月9日) 告訴戴望舒他評論馬爾羅的文章被退，並詳細回應戴望舒對馬爾羅的意見：

恰恰在包朗 (案：Jean Paulhan，時任《新法蘭西評論》主編) 退還給我的稿件中，有我論馬爾羅的一篇。秋季開學時，我將該文修改一下，改投《公社》，同時我準備再投《新法蘭西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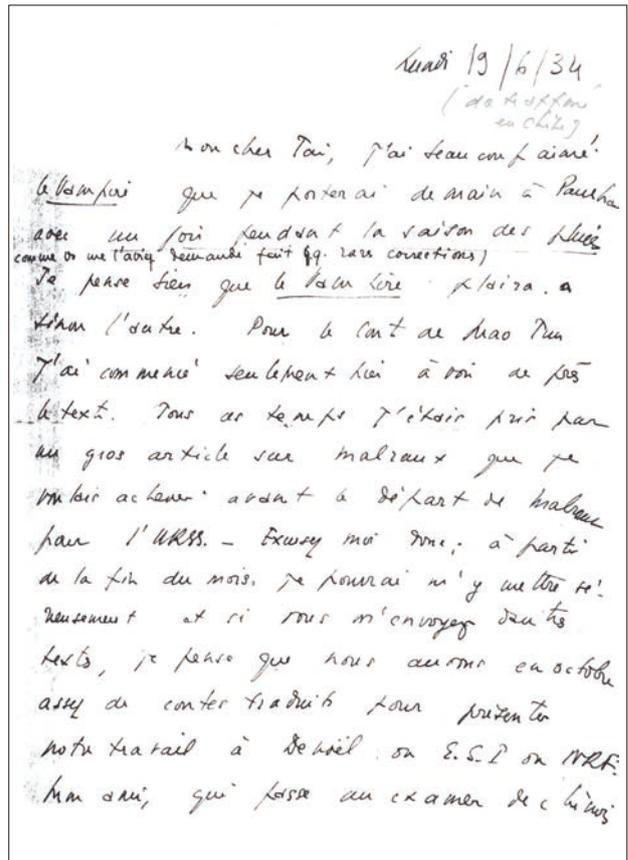
我希望會被接受的，借此也可以回答您對馬爾羅所提的意見：我覺得這些意見大部份是客觀正確的，要不然，在審美觀點上是正確的。[……]

我勸您寫一篇關於馬爾羅的論文。我肯定相信《新法蘭西評論》會高度發生興趣：一個中國人對馬爾羅的見解。當我正在準備的新論文寫成以後，我即寄給您，您可以看到關於馬爾羅的問題，我怎樣看待《新法蘭西評論》的。對於我，在資產階級的雜誌裡，我努力分析資產階級思想系統，正面衝擊它。說甚麼左傾或馬克思主義，我才不在乎。列寧老是叮囑我們，如果迎合手段能夠引導到本源上去的話，那就何妨用一用迎合手段。⁷

上述所引信函提供了重要訊息：艾田伯和戴望舒曾就馬爾羅的小說以至他的政治觀點進行討論。到底戴望舒批評馬爾羅哪些著作？戴望舒所代表的「中國人對馬爾羅的見解」有何獨特之處？艾田伯對馬爾羅又有怎樣不同的評價？戴望舒對三十年代法國左翼文壇以及馬爾羅的理解，如何影響日後對其著作翻譯的選擇？又如何具體構成馬爾羅小說文本進入中國的獨特過程？此等問題由於欠缺文獻資料，歷來學者難以深入探討。直至艾田伯離世以後二年，一封封存了七十年由戴望舒回覆的信件被重新整理出版，相關問題的研究才首次獲得重要的線索。⁸

三、封存七十年的信函

進入上述問題以前，先從兩方面理解信件撰寫的歷史語境。其一，戴望舒跟馬爾羅見面的情況：早於1933年3月21日法國革命文藝家協會一次商討決議案反抗德國法西斯暴行的會議上，詩人曾目睹馬爾羅慷慨陳詞，其時馬爾羅敘述中國革命的第三部小說《人的狀況》的選節已在《新法蘭西評論》（*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N.R.F., 1908—）連載，全書文稿亦即將付梓，並將為他贏取法國最重要的龔固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⁹此時戴望舒從上海抵達巴黎已四個多月，開始接觸法國左翼知識分子，並得到瓦揚—古久列之邀參加是次歷史性集會，當中聚集了當時法國的重要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以及二千多名群眾。他為此寫成〈法國通訊——關於文藝界的反法西斯運動〉一文並於《現代》（第3卷第2期）發表。文章集中報導紀德（André Gide, 1869-1951）的演講內容，強調非共產黨員身份的紀德與無產階級合作反抗法西斯暴行，這與當時法國文壇的關注基本一致。事實上，被戴望舒在文章中簡單記述為「《王道》（*La Voie royale*, 1930）的作者馬爾羅」，也是首次和紀德在政治集會上同台發言。據《人道報》報導，馬爾羅同樣在發言中展示與共產主義者合作的意願：「在[反法西斯]戰爭的情況下，維護人類尊嚴的人們將於思想上轉向莫斯科，轉向紅軍。」¹⁰戴望舒見證著法國左翼文人如何面對歐洲的歷史危機，但他真正思考的其實是中國左翼知識分子面對的兩難處境。戴望舒故意將紀德比附為法國文壇的「第三種人」，進而批評當時中國文壇的



1934年6月19日艾田伯致函戴望舒，向他透露自己正撰寫有關馬爾羅的評論。（手稿複印自法國國家圖書館）

論爭，文章最終引來魯迅猛烈的批評。¹¹

其二，艾田伯和戴望舒討論馬爾羅之時，正值二人開始籌備《公社》雜誌「革命的中國」專號。雜誌專號最終於1934年4月出版，除刊載〈中國革命文學〉(Littérature révolutionnaire chinoise)、〈中國蘇維埃與文化〉(Les Soviets de Chine et la culture)和〈中文書寫法與革命〉(Graphie chinoise et révolution)等重要文章外，還選譯了「左聯」作家丁玲(1904—1986)的〈無題〉和張天翼(1906—1985)的〈仇恨〉，又翻譯農民運動領導者彭湃(1896—1929)講述被捕審訊的〈報刊摘要〉，以及當時上海中英雙語雜誌《中國論壇》(China Forum)刊載的詩作〈囚徒之歌〉，從而向法語讀者展示中國革命文學的不同面貌。基於專號的成功，兩位主編為中國現代小說的翻譯設定更龐大的計劃。從二人往還的書信中揭示，小說集將由瓦揚一古久列或法共黨員兼超現實主義詩人阿拉貢(Louis Aragon, 1897—1982)直接向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Denoël et Steeleh等出版社推薦出版(第5、6號信件)，並邀請拉盧瓦撰寫序言(第11、14號信件)。選集內容不僅包括丁玲的《水》及茅盾著作的翻譯(第8、13號信件)，還包括文藝取向截然不同的施蟄存〈魔道〉和〈梅雨之夕〉兩個短篇(第7、8號信件)。有關出版計劃最終雖未能實現，不過整個選稿、翻譯、校對、出版討論的過程儼然成為艾田伯和戴望舒的「跨文化對話」，其中提及不少當時重要的刊物如《新法蘭西評論》、《歐羅巴》(Europe, 1923—)、《前衛學生》(L'Etudiant d'avant-garde, 1932— ?)、《年輕的革命》(La Jeune révolution, 1932— ?)，亦論及法國著名的知識分子如漢學家拉盧瓦和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作家兼雜誌編輯蓋埃落(Jean Guéhenno, 1890—1978)和波朗(Jean Paulhan, 1884—1968)等等。

從戴望舒與艾田伯的討論可見，詩人對於馬爾羅及其著作的意見，其實緊扣著二十年代自身參與政治活動的個人經驗(包括他曾與施蟄存和杜衡參加共青團，並「跨黨」加入國民黨，還因派發傳單參與宣傳活動被捕)、三十年代全球化左翼思潮發展下中國知識分子對自身處境的考量、中國革命文學以至法國左翼作家視野下中國革命本質性的問題。1934年6月20日，即艾田伯發信翌日，戴望舒立刻回覆並詳細批評了馬爾羅《人的狀況》的寫作：

馬爾羅已在列寧格勒，您完成了有關他的文章？您願意告訴我它將在哪本雜誌發表？我很想讀這篇文章。我自己也想寫一點有關他的東西，尤其是關於《人的狀況》，但由於欠缺時間及一些必要資料，文章未能寫成。無可置疑，馬爾羅十分友善，擁有難得的寫作才華，但他最大的缺點在於錯誤理解中國革命的精神。看看《人的狀況》的人物，近乎所有人物都是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投身革命亦只是出於個人關係，他們將革命視為一種逃避人類命運的方法。小說裡沒有一個無產階級的人物擔當重要角色。所有這些描述都是虛假的，也使中國革命顯得滑稽可笑。另一方面，近乎所有人物都是歐化的，或更確切地說是法國化的。這些都予我們中國人觸目驚心的印象。他避免描寫典型的中國人，不敢面對上海的無產階級，因為他未能充份理解他們。結果：他在我們眼前展示的是無政府主義革命的圖像，屬其他地方的，很遙遠的。[……]總而言之，馬爾羅是個極具才華的作家，但他沒有能力理解革命。(他甚至同情托洛斯基！)¹² (筆者自譯)

戴望舒站在艾田伯所代表這面龐大的法國左翼知識分子鏡子面前，彷彿同時看見自己作為革命者的身影。他抱持強烈的國族身分認同，藉著第一人稱眾數代詞(「我們」、「我們中國人」)的敘事角度，向艾田伯表述他所代表的中國人民對馬爾羅「錯誤理解中國革命的精神」，致使「中國革命顯得滑稽可笑」的不滿。戴望舒的批評源自個人經歷與馬爾羅對中國革命的文學表述之間的落差。在其筆下的中國革命，一方面由

個人主義知識分子所推動，並為著逃避人類命運尋找出路而進行革命，展示的不過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革命畫面」；另一方面完全歐化的革命人物形象，無法把握典型中國人物以至上海無產階級的寫法。若學者普遍認為《人的狀況》刻意通過支離破碎的描述模糊上海地形所代表的革命空間，是有意識地削弱迎合西方讀者心理的異國情調，¹³ 那麼小說裡中國革命人物的「異國形象」就是作家無法跨越文化距離所產生的缺憾。戴望舒和艾田伯有關馬爾羅的討論意見，深遠影響了詩人在抗日戰爭時期以翻譯作為「內在抵制」的策略之下對馬氏小說文本的選擇。¹⁴ 至於戴望舒於信末批評馬爾羅「同情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1879-1940)，針對的更是馬氏在托洛斯基流亡法國期間的行動和言論，¹⁶ 這直接構成艾田伯對戴望舒作為「嚴酷的、正統的共產主義者」的判斷。¹⁵

四、中國現代主派與歐洲左翼文藝研究的幾個面向

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作為二十世紀兩種最具影響力的思潮，如何跨越地域、語言和文化的界限在不同國度「相遇」(encounters)？二十世紀中國嚴峻的政治和文學環境又怎樣成就兩種思潮「相遇」的獨特形式？上文所引戴望舒與艾田伯的書信，不僅記錄了三十年代中、法兩地知識分子交互鏡像之中所折射的左翼文人姿態，它還透露了二十世紀跨文化脈絡之下現代主義和左翼思潮（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之間種種虛實形式的「相遇」：當時已因象徵主義詩歌的創作而廣為人知的中國現代派詩人戴望舒，分別與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紀德馬爾羅和艾田伯在巴黎「相遇」、西方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特定的歷史語境之下「相遇」，以至中國現代派在政治和文藝層面上與歐洲左翼思潮不同形式的「相遇」。針對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中國現代派與歐洲左翼文藝各種相遇和交鋒，我們嘗試提出幾個不同的探討方向。

其一，從跨文化的角度審視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派如何透過「法語」左翼知識分子的視野，窺探十月革命前後俄蘇文學及文藝理論的發展，並通過翻譯和轉譯的特定文本，為當時由「左聯」主導的中國文壇注入各種有別於蘇共官方意識型態的異質聲音。二十世紀「法語」左翼作為歐洲特殊的左翼文化群體，匯集了法國、比利時、瑞士以至俄羅斯、波蘭等地流亡法國並以法文寫作的左翼知識分子，正因他們經歷不同的政治處境和個人遭遇，展示的是左翼思想內部多元分化的觀點。這方向的討論關注中、法、俄三地重要的文化中介者(médiateur)：留學法國的中國現代派詩人戴望舒，來自猶太裔俄國傳統家庭而流亡德國、比利時和法國的俄蘇文學評論家高力里(Benjamin Goriély, 1898-1986)，以及比利時出生、移居法國的俄裔革命家兼作家謝爾蓋(Victor Serge, 1890-1947)。歷史的機遇讓他們的親身經歷和思考，成為不同文化背景左翼知識分子的參照。不論高力里著、戴望舒翻譯的俄蘇文學評論《俄羅斯革命中的詩人們》(*Les Poètes dans la révolution russe*, 1934) 內部各種思想



馬爾羅《希望》的中文翻譯，於1941年6月16日開始在《星島日報》副刊《星座》連載。(藏中文大學圖書館)

的競逐、謝爾蓋向法語讀者引介的新俄文學，又或戴望舒從法語轉譯的俄國戰爭小說《鐵甲車》（*Bronepoyezd 14-69, 1922*）所表現的國際主義以及「中國式」的異國情調，都必需重置於整個文學文化生產、翻譯與傳播的歷史語境，再作審視。

其二，關注歐、亞戰爭語境下中國現代派對戰後法國現代主義、左翼文藝以及其他文藝思潮的解讀。穆杭（Paul Morand, 1888-1976）的寫作一直被視為「中國第一個現代主義小說流派」新感覺派的重要影響來源，¹⁷ 但其小說的異國風情及跨國性元素直接指向戰後歐洲的社會處境，作品更循曲線途徑論述一次大戰本身及戰後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等各種思潮。穆杭提倡不與民族主義對抗的「新世界主義」理念及對異國情調在文學應用上的反思，揭示戰後法國現代主義寫作的內在複雜性，並重塑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滬、港兩地刊載穆杭〈六日之夜〉（*La nuit des six jours, 1924*）四種中文翻譯及重譯的語境脈絡，考察小說文本如何從歐洲戰爭進入亞洲歷史的政治鬥爭（大革命失敗以後的上海）、戰爭現實（二戰時期業已淪陷的香港）以及不同美學傾向之間的競爭（港滬兩地的左翼文藝與現代主義思潮）。相對而言，1938年戴望舒因上海淪陷而避戰南下，利用抗日戰爭時期香港報刊有限的文化空間進行「內在抵抗」，翻譯及評論與戰爭主題相關的著作，當中包括以及薩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同樣針對西班牙內戰（1936-1939）的創作，戰火陰霾之下卻又不忘「詩情」的探索。相關著作對戰爭的思考，通過翻譯和評論構成跨越時空的戰爭語境之中另一場深刻的思想對話。

其三，重置中國現代派於先鋒性（*avant-garde*）和現代性（*modernité*）的理論脈絡，通過其普羅文學和都市風景兩種截然不同的書寫，重新探討他們自處的複雜位置。三十年代轉折之際，亦是「左聯」成立的關鍵時期，中國現代派的「作家—譯者—編輯群」在文學日益政治化的壓力之下出版《新文藝》雜誌（*La Nouvelle littérature, 1929-1930*），通過選譯、引介、評論回應世界各地「新興文藝」的發展。儘管他們以先鋒者的姿態追求藝術和意識型態的革新，但自身參與普羅文學創作的嘗試和失敗，清晰彰顯了政治與藝術之間無法協調的張力和矛盾。另一方面，劉訥鷗（1905—1940）、穆時英（1912—1940）、葉靈鳳（1905—1975）等現代派作家對都市風景的書寫及以香港作為鄉村自然的隱喻，均透露了中國現代派作家對自身所處位置的定位以及思考角度。若配合近年隱喻研究的新發展，我們得以重新檢視現代派小說如何通過自然景物為喻建構都市意象，將陌生的城市景觀納入他們的認知範疇，又或逆向以都市為參照重新定義自然的論述，展示現代經驗轉化的曲折過程以及他們對都市獨特的感知模式。

五、小結

面對戰爭現實以及國內文藝高度政治化的發展，中國現代派作家在藝術和政治層面均保持先鋒者激進改革的姿態，從而構成了他們思想和寫作的內核。中國現代派和歐洲左翼文藝的研究方興未艾，它將為跨國的現代主義論述提供不同的探討方向，亦為「全球化」和「在地化」的左翼文藝研究提供「左聯」以外的考察對象，開拓相關課題的研究視野。

尾注

- 1 1937年傅東華在〈十年來的中國文藝〉一文提出「現代派」的形成，以為施蛰存、杜衡、穆時英、葉靈鳳和戴望舒等作家「雖不曾造成一種思潮，卻曾造成了一種特殊的『趣味』。……他們在歷史上各人都本無所隸屬，而由於同在一個刊物[《現代》]上做稿，或由私人交誼的比較密切，氣味之比較相投，就彷彿成為了一個集團的模樣。……他們在文藝的趣味上，也確有一個共同之點。」見傅東華：〈十年來的中國文藝〉，《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第一集·文學理論集一（上海：上海文藝，1987年），頁287-288。
- 2 相對而言，三十年代德國新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Georg Lukács, 1885—1971）、布·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和阿多諾（Theodor Adorno, 1903-1969）之間的論爭，同被視為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主義對抗和相互作用的獨有形式，更同時展示馬克思主義美學原則較為靈活柔韌的一面。Eugene Lun, *Marxism and Modernism: An Historical Study of Lukács, Brecht, Benjamin and Adorn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 1-6.
- 3 參考鄭可怡：《黑暗的明燈——中國現代派與歐洲左翼文藝》，（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年）。
- 4 René Etiemble, *Quarante ans de mon maoïsme, 1934-1974* (Paris: Gallimard, 1976), p. 17.
- 5 Letter from Etiemble to G. Lee, 17 June 1983, cited in Gregory Lee, *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4.
- 6 1933年11月至1935年1月，艾田伯給戴望舒寄出十八封信函，一直被戴望舒小心保存。八十年代初，施蛰存從戴望舒的遺物裡發現這批信札，交由徐仲年翻譯，並於《新文學史料》發表。西方學者利大英於1989年出版戴望舒研究的英文專著 *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直接從法文翻譯了十八封信函，收入該書的附錄。由於信札的中文翻譯誤譯之處甚多，相對而言利大英的信函英譯準確，且對各信件之撰寫及郵寄日期均作仔細整理，本文引用的信函內容以利大英的譯本為主。十八封信札的法文原稿影印本，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檔案及手稿」部的「雷諾·艾田伯資料庫」（Fonds René Etiemble），編號NAF 28279。參考〈艾登伯致戴望舒信札（1933—1935）〉，《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頁215-218；Letters from Etiemble (1-18), "Appendix 2: Letters To, From and Concerning Dai Wangshu," in Gregory Lee, *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 pp. 303-318.
- 7 Letter from Etiemble to Dai Wangshu (10), in Gregory Lee, *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 p. 312; 中譯參考〈艾登伯致戴望舒信札（1933—1935）〉，《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頁220。
- 8 此信的法文原稿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首次收入Muriel Détrie (dir.), *France-Chine: Quand deux mondes se rencontrent* (Paris: Gallimard, 2004), pp. 114—115。雖然此書所載三封艾田伯和戴望舒之間的信件（1934年6月19日、1934年6月20日、1934年8月9日）均表示為未出版書信，但事實上6月19日和8月9日兩封信函的中文及英文翻譯已於八十年代出版，只有6月20日這封信的原文及翻譯從未刊載。
- 9 參考André Malraux, *La Condition humaine*(I)-(VI),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n° 232-237, jan-juin 1933; André Malraux, *La Condition humaine*, (Paris: Gallimard, 1933).
- 10 « A l'appel de l'Association des écrivains et artistes révolutionnaires », *L'Humanité*, Le 23 mars, 1933, p. 2.
- 11 魯迅：〈又論「第三種人」〉，《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531—536。
- 12 Correspondence inédite de Dai Wangshu, Le 20 juin 1934, in Muriel Détrie (dir.), *France-Chine: Quand deux mondes se rencontrent*, pp. 114-115.
- 13 Zhang Yinde, "La Tentation de Shanghai: espace malrucien et hétérotopie chinoise," *Présence d'André Malraux. Cahiers de l'Association Amitiés Internationales André Malraux* (Malraux et la Chin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Pékin, 18, 19 et 20 avril, 2005), n° 5/6 (printemps 2006), p. 84.
- 14 雖然戴望舒認為馬爾羅擁有「傑出的寫作才華」，但他卻無法真正理解中國革命精神，因此抗日戰爭期間戴望舒捨棄了馬爾羅兩部以中國革命為主題的小說《征服者》（*Les Conquistadors*, 1927）和《人的狀況》，而選譯他另一部描寫西班牙人民奮力反抗法西斯政權的長篇小說《希望》（*L'Espoir*, 1937）。參考馬爾羅著，戴望舒譯：〈《火的戰士——希望》片斷之一〉，《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3日；〈反攻——「希望」片斷之一〉，《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14日；〈死刑判決〉，《大風》第17期（1938年8月15日），頁533-535；〈烏拿木諾的悲劇〉（上、下），《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10月7-8日；〈克西美奈思上校〉（上、下），《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10月13-14日；《希望》（一至一四八），《星島日報·星座》，1941年6月16日至12月8日。上述篇章收入鄭可怡編校：《戰火下的詩情——抗日戰爭時期戴望舒在港的文學翻譯》（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32—260。
- 15 1929年 托洛斯基被斯大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驅逐出境，至1933年7月他從土耳其流亡至法國，並從南部的馬塞（Marseille）轉往西部城市魯瓦揚（Royan）附近的小鎮聖帕萊（Saint-Palais）隱居養病。期間馬爾羅不僅成為托洛斯基流亡法國時負責其安全的小組成員，他日後甚至宣稱是當時為數不多願意公開維護托洛斯基的法國知識分子之一。筆者曾於2015年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辦「視覺再現、世界文學與現代中國和東亞的左翼國際主義」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互為鏡像的中法左翼作家：一場有關馬爾羅尚未展開的討論〉一文，詳細討論相關問題。另參考André Malraux, "La Réaction ferme l'Europe à Léon Trotsky," *La Vérité*, n° 204 (Le 4 mai, 1934) ; Robert S. Thornberry, "A Spanish Civil War Polemic: Trotsky versus Malraux,"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24, No. 3, André Malraux Issue (Autumn, 1978), pp. 324-325.
- 16 艾田伯曾向利大英憶述，戴望舒對托洛斯基懷有極度的敵意。參考Letter from Etiemble to G. Lee, 17 June 1983, cited in Gregory Lee, *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 pp. 34-35: "Très violemment hostile à Trotsky, que je défendais, admirais, moi, ce qui me valait chez les orthodoxes la réputation exagérée de trotskiste. (Very violently hostile to Trotsky, whom I defended, even admired which got me the exaggerated reputation of being a "Trotskyist" with the orthodox [Communists].)"
- 17 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頁125。
- 18 Zhang Yinde, "La Tentation de Shanghai: espace malrucien et hétérotopie chinoise," *Présence d'André Malraux. Cahiers de l'Association Amitiés Internationales André Malraux* (Malraux et la Chin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Pékin, 18, 19 et 20 avril, 2005), n° 5/6 (printemps 2006), p. 84.

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合辦

「第六屆中國文化研究所青年學者論壇」 (2019年5月23－25日)



第六屆「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於2019年5月23至25日舉行，論壇旨在培養中國文化研究領域的青年學者，並增強青年學者之間的互動往來。今屆主題為「百年流變：再思五四遺產」，邀得33位年青學者前來中文大學報告研究成果。論壇分三天共11節舉行，與會者就五四運動各個議題，如五四與知識分子、五四與學生世代、五四與青年運動、五四與中國傳統、五四與新女性、五四與婦女運動、五四與經典文本、五四與中國社會等議題發表論文及展開熱烈討論。

大會特邀各範疇的資深教授為相關組別作主持及評論員。獲邀的教授分別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歷史系、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翻譯系、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等等。

本年度的論壇共收到144個申請，經過籌備委員會的嚴格甄選，最終邀請其中33位學者出席會議。與會者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亞洲其它國家、歐美地區，其中超過半數的與會者來自海外，體現論壇推動中國文化研究的國際性交流的主旨。

以下為兩位青年學者的與會經驗分享。

曲楠

哈佛大學、北京大學



恰逢香港中文大學建校55周年之際，參加與校近乎同齡的中國文化研究所「青年學者論壇」，是「幸甚至哉」的難得體驗。作為一塊「年輕」的人文研究陣地，文化研究所在內涵與運轉上已實屬老練，而本次青年論壇的中心議題「百年五四」，早已在眾聲喧嘩的紀念浪潮中積澱成傳統。在「老」與「幼」的張力之中，本次青年論壇方凸顯了它優異的位置，尚處於成長期的青年學者，跨越國族、專業、宗教、語言與時區，以百年前五四人物「同齡者」的身份，敢發異聲，善撻人心，再造生氣淋漓的「話語空間」。

此次論壇的諸多議題，不僅多關注歷史現場的青年形象，更有意考察五四社會與現代國家創生緊密關聯的「青年氛圍」。誠然，「五四」本身兼容著「老」與「幼」，跨越生理年齡與代際，這種文化氛圍的「青春特質」，同樣促成了本次論壇的師生齊聚，最大化地啟動了對話與合作的能量。本次青年論壇的創造力還在於，參會師生自覺而豐沛的問題意識，會議現場常是爭辯多於立論，疑問勝過斷言。實際上，這種問題意識源自與會青年清醒的危機感。作為1980—1990年代出生的人文學者，面對走過百年的悠悠五四，大概都會有這樣的自省：如何抵抗對五四歷史記憶及其精神遺產的遺忘？如何規避論述中的斷裂與暴力，不再輕易被托舉為符號的「五四」神話所徵召，同時亦不刻意回絕對「五四」遺產的有效參與？五四作為思想操練的磨刀石，其對話當下諸多問題的關節點又在何處？……如此種種皆意味著，當代青年學人註定要同百年前的五四／後五四青年一樣，在「哪裡走」的困惑、焦慮而非絕對清晰中展開研究。這需要創造的青年，也正是青年的創造。



嚴詩喆

新加坡國立大學

行程緊湊的三天會議，讓與會者跳出「纏鬥」研究課題的日常，收穫來自不同專業方向的洞見、啟發和提點。筆者的文章在近現代思想史的框架下考察知識分子在台灣的「五四」傳承與反思，通過會上討論和私下交流，獲得來自不同方向、視角的指正和啟發，希望藉此機會真誠致謝！首先感謝葉嘉教授的主持。葉教授的點評和建議，提示我注意「翻譯」這一面向，讓我重新思考「翻譯」作為知識分子自我建構的方法，在研究個案中的體現，以及回應「五四」議題的潛力。其次感謝我的論文點評人馮佳老師，參與討論的賴佩暄老師、李枝航博士、李剛博士等，還有私下交流、建議的王興老師、姜曉敏博士等。他們從概念界定、詞源考古、行文佈局、台灣研究、教育史視角等多重面向給我以啟發和提點，使我真切體會到學術分工與合作的密切關聯和深意所在。此外，感謝所有與會者的精彩報告和熱烈討論，正是每一篇文章的貢獻、由此形成的合力，為我們從更多元的面向、重塑一世紀前的「五四」，進一步打開研究的視野和思路，看到自己的專業方向與更大學術議題的相互關聯和對話潛力。

最後，衷心感謝會議主辦方統籌、組織這樣一場意義重大、成果豐富的青年學者論壇，特別感謝會議主席黎志添教授，感謝籌委老師們，以及促成這場盛會的所有工作人員！



文物館

第六屆博物館專業交流項目： 展覽策劃與典藏管理

承蒙北山堂基金支持，在剛過去的四月，文物館舉行了第六屆博物館專業交流項目（前稱「博物館專業培訓工作坊」），主題為「展覽策劃與典藏管理」，並首次與日本的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合辦。交流項目沿用過去的「演講+分組策展+實地考察」模式，二十四位來自內地、香港及澳門的博物館專業人員，在兩星期內與世界各地資深博物館工作者緊密交流及學習。



中國藝術再想像：文物跨界 點子召集

為繼續鼓勵同學發掘自己與中國藝術的關係，文物館舉辦了第二屆「中國藝術再想像：文物跨界點子召集」比賽。一如往屆，今年的參加者中亦同樣包括來自文學院、醫學院及社會科學院的同學，但新增了理學院和商學院的同學，同時亦成功吸

引校外人士報名。同學的參賽作品形式多樣，創意非凡，除了繼續有文字類作品如故事及歌詞改編，今年的非文字類作品也是百花齊放，包括有漫畫、影像藝術、通訊軟件貼圖、產品設計等。



藝術一點點

「藝術一點點」由4月至8月每月舉辦一次，一共5次，由文物館館長姚進莊教授介紹清末繪畫大師任伯年的藝術作品。4月、5月及6月的導賞已於4月26日（星期五）、5月18日（星期六）、6月11日（星期二）在文物館展廳II舉辦；共吸引了45人參加。

皇朝禮器公開講座

「皇朝禮器公開講座」於本年4月26日（星期五）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L1舉行，共41人出席。講座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賴毓芝主講，講題為「清宮《皇朝禮器圖式》的製作與所謂『外銷畫』的關係」。



妙筆傳神萱暉堂講座系列

承蒙萱暉堂贊助，文物館於本年3月至8月舉辦「妙筆傳神萱暉堂講座系列」，推廣清末繪畫大師任伯年的藝術。系列的次講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賴毓芝教授主講的「北齋在上海：任伯年作品中的日本養分」。講座已於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在中國文化研究所L1舉行，共39人出席。



5月份講座分別由台北故宮書畫處處長劉芳如女士與愛丁堡大學愛丁堡藝術學院藝術史學院副教授楊佳玲博士主講，講題分別為「略談台北故宮藏任伯年及海派繪畫」與“Circle of Ren Bonian and the Entertainment World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6月份講座分別由中國美術館研究部助理館員李暨涵先生與中國美術館典藏部副研究館員張希丹女士主講，講題分別為「任伯年的創作與19世紀中葉的上海」與「中國美術館藏任伯年藝術導讀」。

博物館幕後談

「博物館幕後談」系列在五、六月邀請了文物館的同事與學生分享工作內容。5月29日（星期三）的嘉賓是出身蘇州錶畫世家的謝光寒先生，與他的學徒梁啟軒先生和楊夢竹小姐。6月17日（星期一）除了由三位再分享一場之外，亦請來文物館館長姚進莊教授分享展覽策劃的心得。三場活動共有57位同學參與。



週六藝賞遊

文物館於6及7月舉辦「週六藝賞遊」，讓參加者透過展覽導賞、小手工與小遊戲加深對海派大師任伯年的認識。首2場活動於6月15日（星期六）及6月22日（星期六）在文物館東翼2樓活動室舉行，共吸引46人出席。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第五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

「方言語法博學論壇」由香港中文大學和中山大學在2015年發起，自2017年開始加入復旦大學，並由這三所學府輪流主辦，作為促進方言語法比較研究的平台，著重粵語、吳語等東南方言的比較研究，推動跨地區研究，並加強學術交流和對話。「第五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由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辦，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協辦，於2019年6月15－16日舉行。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陳靜中國歷史教學獎」頒獎典禮

「陳靜中國歷史教學」頒獎典禮於四月八日假座中大祖堯堂舉行，由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教授擔任主禮嘉賓，兩位得獎者為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歷史科科主任袁梅芳，以及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協作副校長陳嘉雯，每人可獲獎章一枚、獎狀一紙，以及獎金港幣二萬元；此外香港培道中學陳瑩瑩、香港真光中學區實文、文理書院（九龍）張天慧等三位資深教師則將獲頒發嘉許狀。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學術講座

2019年4月至6月，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舉辦了6場午餐講座，主題包括公民社會、鄉村治理、中央地方財政關係等等。講座共吸引了一百多名觀眾，包括本地、內地和海外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個學術機構的學者、記者、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和社會公眾，在討論期間提出了許多富有洞察力的評論和問題，引發廣泛且深入的討論。現場氣氛熱烈，講座收到廣泛關注及好評。

紀錄片放映會及導演座談會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組織紀錄片放映系列活動「回望－紀錄片觀摩系列」。該系列旨在推廣當代中國紀錄片，重點關注民間歷史和真實人物。2019年4月至6月，共放映兩場，即《廣場上的舞蹈》放映會（4月12日）和《四個春天》放映會（5月10日），共吸引了300多名觀眾。

期刊

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8 期

該期刊載論文六篇、書評論文一篇、書評十三篇，共約三百頁。

論文

1. 李洛旻：〈《荀子》「接人則用拙」解詁及其禮學意涵〉
2. 楊 博：〈戰國楚竹書非「史書」類文獻史料內涵析論〉
3. 郭偉濤：〈漢代弱水中下游流域邊防系統中的「置」〉
4. 莫德惠：〈明嘉靖初王陽明世爵終止問題考論〉
5. 盧敏芝：〈「藝術的社會主義」：田漢、南國運動與左翼世界主義視野下的唯美主義藝術實踐〉
6. 陳煒舜：〈興亡閱盡垂垂老，我亦新華夢裏人：袁克權、張伯駒詩作中的家族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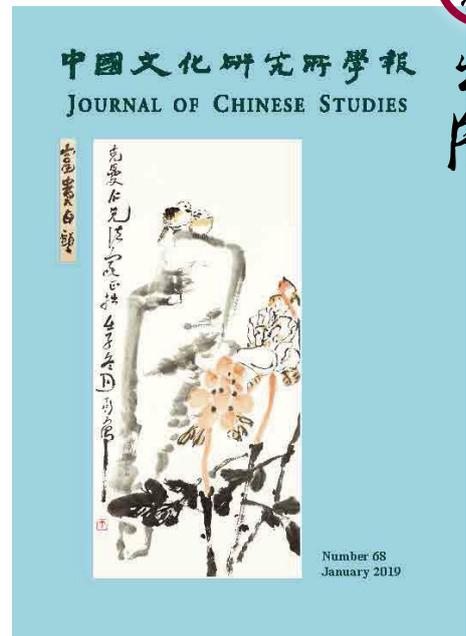
書評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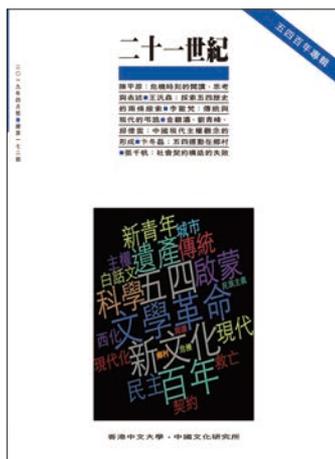
1. Christoph Harbsmeier,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書評

1. Ellen Widmer, "*Bannermen Tales (Zidishu): Manchu Storytelling and Cultural Hybridity in the Qing Dynasty*. By Elena Suet-Ying Chiu"
2. Rana Mitter, "*China's Conservative Revolution: The Quest for a New Order, 1927–1949*. By Brian Tsui"
3. Fredy González, "*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 By Fei-Ling Wang"
4. Michela Bussotti, "*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Suyoung Son"
5. Cynthia J. Brokaw, "*Brush, Seal and Abacus: Troubled Vitality in Late Ming China's Economic Heartland, 1500–1644*. By Jie Zhao"
6. Tze-ki Hon, "*Civilizing the Chinese, Competing with the West: Study Societies in Late Qing China*. By Chen Hon Fai"
7. Tim Wright, "*Navigating Semi-Colonialism: Shipping, Sovereign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China, 1860–1937*. By Anne Reinhardt"
8. Keith McMahon, "*Reading for the Moral: Exemplarity and the Confucian Moral Imagin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Short Fiction*. By Maria Franca Sibau"
9. Hilde De Weerd, "*State Power in China, 900–1325*. Edited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aul Jakov Smith"
10. Haun Saussy, "*Reading Philosophy, Writing Poetry: Intertextual Modes of Making Meaning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By Wendy Swartz"
11. On-cho Ng, "*Apophatic Paths from Europe to China: Regions without Border*. By William Franke"
12. 何漢威, "Speaking of Profit: Bao Shichen and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y William T. Rowe"
13. 容世誠, "吳存存：《戲外之戲：清中晚期京城的戲園文化與梨園私寓制》"

詳細內容請瀏覽：<http://www.cuhk.edu.hk/ics/journal/chi/journal.html>





《二十一世紀》2019年4月號，第172期

今年適值「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二十一世紀》特意刊出「五四百年專輯」，邀請多位名家分別從歷史、思想、文化等角度，針對老問題闡發新觀點。

「二十一世紀評論」刊出陳平原的〈危機時刻的閱讀、思考與表述——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王汎森的〈探索五四歷史的兩條線索〉及李歐梵的〈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弔詭〉；而「學術論文」、「景觀」及「書評」等欄目的文章，都圍繞五四運動的種種作出討論與闡釋。

學術論文

金觀濤、劉青峰、邱偉雲 中國現代主權觀念形成的數位人文研究

張千帆 契約構造的失敗——從辛亥到五四

卞冬磊 五四運動在鄉村：傳播、動員與民族主義

邵棟 五四新文學場域與劉半農的思想轉向

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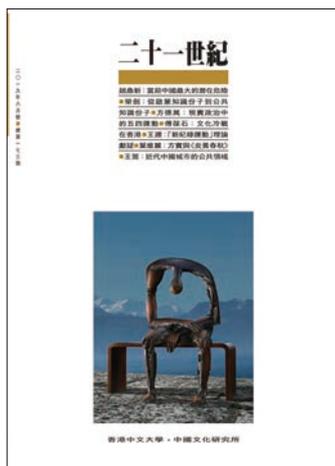
劉文英 西化與現代化：民國時期的書刊雜誌設計

書評

區志堅 從閱讀文化看知識資源——評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

劉進才 文本、圖像與視野——評陳建華《文以載車：民國火車小傳》

申博聞 「五四史」的另一種書寫——評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



《二十一世紀》2019年6月號，第173期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以「知識人與公共性」為題，配以多篇牽涉公共性討論的文章一併刊出，希望從中國的處境入手，通過方方面面的細部討論，拼湊出一條粗略可辨的思路。

二十一世紀評論

趙鼎新 當前中國最大的潛在危險

榮劍 從啟蒙知識份子到公共知識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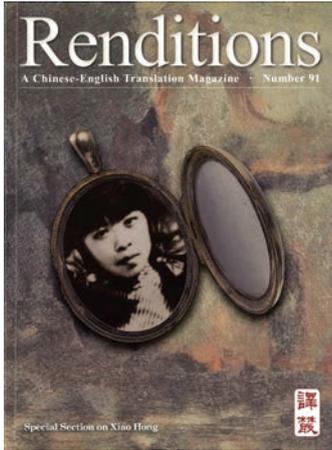
學術論文

方德萬 現實政治中的五四運動

傅葆石 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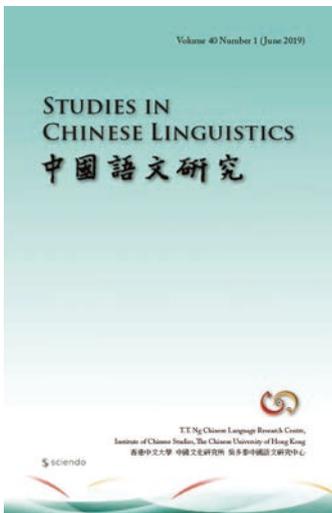
董國強、樊建政 文革時期「極左思潮」個案：上海「反復辟學會」（上）

王遲 中國「新紀錄運動」理論獻疑



翻譯研究中心《譯叢》(English version only)

Renditions no. 91 is a general issue featuring a diversity of works originally writt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 begin with a special section devoted to seven relatively little-known short pieces by the extraordinary and tragically short-lived writer Xiao Hong 蕭紅, elegantly rendered by the distinguished translator Howard Goldblatt. Other features comprise Zhu Xiang's 朱湘 long satirical poem 'The Cat's Admonition' 貓誥, a compact and clever allegory of the disposi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immediate post-May Fourth era; 'The Man from Greece' 希臘人 by Lin Cantian 林參天, one of our first ventures into publishing translations of literature written in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hotograph' 一張照片 by Yeh Hsia-Ti 葉霞翟, the love story of the author and the brilliant Nationalist general Hu Zongnan 胡宗南.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中國語文研究》第 40 卷第 1 期

《中國語文研究》第 40 卷第 1 期已經出版。本期刊載三篇英文文章：

1. Mara Frascarelli、Marco Casentini：空主語在激進空主語語言中的解釋：漢語的主題鏈與話語語義的要求
2. 董成如、金大衛：“什麼”反問句否定意義推導的修辭三段論研究
3. Lani Freeborn、John Rogers：影響第二語言普通話外國口音程度的非語言學因素

期刊由 Sciendo (原 De Gruyter Open) 以開放取用形式發行，文章可以從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的網頁下載：<http://www.cuhk.edu.hk/ics/clrc/>。

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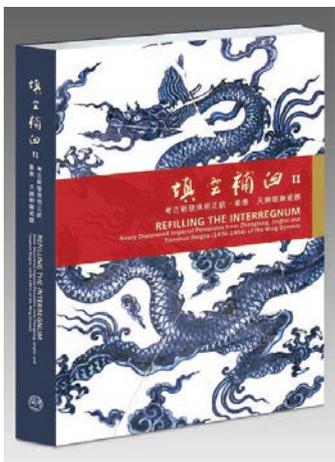
《民國人筆下的民國》

2017 年 5 月，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了「民國人筆下的民國」國際學術討論會。隨着近年民國人物的檔案、日記、回憶錄等新史料相繼開放和出版，為歷史學者深化民國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契機，研究成果迭出，蔚為風氣。是次學術討論會邀請了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日本及韓國等地二十多位民國歷史研究者發表學術成果，尤其着意通過考究日記、回憶錄等彌足珍貴的歷史材料，揭示民國以降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因由，以及親歷其境的民國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文物館《雲行雨施：中國龍文物》

本書為展覽「雲行雨施：中國龍文物」之同名圖錄，全書以彩色精印，中英對照。當中收錄近二百項龍文物，歷新石器時代至二十世紀，包括陶瓷、金銀銅器、玉石、文玩、織物及繪畫等，並收錄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教授及中大文物館前館長林業強教授撰寫之專題文章。



文物館《填空補白 II：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

本書為展覽「填空補白 II：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同名圖錄，全書以彩色精印，中英對照。收錄 158 件套御窯瓷器標本，均精選自景德鎮御窯博物館珍藏，以 2014 年景德鎮御窯廠最新考古發現為核心，分為「石破天驚」、「帝王好尚」、「宴饗用器」、「盛世餘緒」、「承前啟後」及「綻放異彩」六個單元，圖版以多角度多細節呈現為特色。此外，圖錄同時收錄研究專文五篇，除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長江建新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助理研究主任（器物）王冠宇博士力作外，誠邀景德鎮陶瓷大學古陶瓷研究所及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考古及文物修復專家團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候選人高惠平先生，以及韓國高麗大學考古美術史學科兼任教授金恩慶博士惠賜洪文。另附正統至天順大事年表、宣德至成化瓷器紋樣對比表、三朝紀年瓷器表、紀





藝術一點點 (主辦：文物館)

Lunch 吃飽肚子之後，讓眼睛也一飽眼福吧！抽20分鐘來文物館，聽館長為你介紹精選展品，為你忙碌的生活增添一點點藝術養份！

日期：2019年7月5日（星期五）、2019年8月16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1時30分至1時50分

集合地點：文物館展廳II書店

語言：粵語



妙筆傳神萱暉堂講座系列 (主辦：文物館)

2019年8月16日（星期五）下午3時至5時

講題1：妙筆傳神——任伯年的人物畫

講者1：周晉（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副教授）

語言：普通話

講題2：徐悲鴻所作之任伯年畫像

講者2：陳芳芳（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

語言：粵語

報名：<https://goo.gl/forms/YWrbZ9Q0leWOJ7cY2>



銀鏈古法編織工作坊 (主辦：文物館)

中國古代貴金屬的鏈飾美侖美奐，但其編織技術少有研究。「中國古代黃金工藝」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周大福大師工作室等機構的合作研究項目，首次以跨學科方法復原古代黃金工藝，釐清其發展歷史。

日期：

2019年7月14日（星期日）

2019年7月2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5時正

地點：LOUPE（地址：中環鴨巴甸街35號PMQ元創方H410）

名額：每場10人（必須預先報名及繳交按金\$200）

對象：12歲或以上人士

語言：粵語

備註：課程將提供材料及工具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午餐講座」

即將舉辦的午餐講座

題目：少數民族流動中的選擇：以布依族為例

日期：2019年7月9日（星期二）

時間：12:00 – 13:30

講者：段海燕 講師

機構：華東政法大學 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語言：普通話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田家炳樓8樓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會議室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研究系列研討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成績令世人矚目。但是，伴隨著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各類矛盾和問題也接踵而至。2013年以來中國政府多次強調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涉及與社會發展相關的各種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中國的政策決策是一個政府、學界、智庫、目標人群廣泛參與協商的過程，而學界和智庫在其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為推動相關的學術交流和政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將舉辦「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研究系列研討會」，第五次會議的主題為「中國教育體制的回顧與展望」，將於2019年7月23日召開。我們將邀請來自海外，內地及香港本地的九位學者，以國際化和比較研究的視野，共同討論如何改善中國的教育體系（或政策），以覆蓋弱勢群體作為農村學生等。我們歡迎各界專家學者共聚一堂，集思廣益，共同探討中國社會的現狀及未來。

日期：2019年7月23日（星期二）

時間：9:00 – 18:0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田家炳樓八樓，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編輯委員會

主 編：黎志添

成 員：楊淨嵐